

# 一个中国历史学家的日本观\*

——《人民中国》记者采访录

## 日本当局为何在侵华战争性质问题上出尔反尔？

记者：2月20日，您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上作了《日本当局为什么在侵华战争性质问题上倒退？》为题的发言，对竹下登首相为裕仁天皇开脱战争罪责，为日本侵略中国的战争辩解提出批评，深得人心。

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早已是铁证如山。可是，日本当局对此或极力回避，或闪烁其词，或出尔反尔甚至倒退，这究竟是因为什么？作为一位历史学家，请谈谈您的看法。

刘：1982年教科书事件发生后，我曾写过一篇文章——《历史是伟大的教师》，讲的就是这个问题。从日本历史的演变来看，它的每一次社会制度的更替，差不多都

\* 载《人民中国》（日文版）1989年第8期，记者沈兴大。

是自上而下的改良，旧势力的相当一部分常常在新社会中生存、保持下来。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在美国军队占领下，实行非军国主义化和民主改革，也是这样；美国垄断资产阶级非常害怕日本人民力量壮大，害怕日本发生所谓“共产革命”，特意对旧势力加以扶植利用。因此，有些被“整肃”的战犯不久又东山再起，并重新掌握权力。

记者：这方面的情况，能否举些例子？

刘：战后日本头一个首相吉田茂，就是被远东军事法庭列入战犯名单的人。试想，像吉田茂这样的人能承认侵略战争的事实吗？

还有一个例子。日本外务省档案馆有一个对外开放的陈列室，我去看过。这个陈列室，把日本明治维新以来的重大事件用大幅照片陈列出来，共有 20 多幅。其中有两幅特别刺眼，是日本承认“满洲国”和汪精卫“南京政府”的情景。众所周知，所谓“满洲国”和“南京政府”，完全是日本军国主义一手制造的傀儡，是中国人民所不能容忍的。可直到今天，日本当局并不认为这是不义的行动，反而把它们作为正面的历史陈列出来。最后一幅是日本投降签字的仪式。而照片上的说明却叫做“终战”，就不肯承认历史事实。

记者：相比之下，联邦德国的情况却不是这样。

刘：是的。当年德国是无条件投降的，希特勒的法西斯势力基本上被摧毁了。因此，情况就大不一样。1985

年8月，我去联邦德国参加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到会的各国历史学家有四千来人，规模宏大。开幕的那天，联邦德国总统魏茨泽克致词。其中最有意思的是这么一句话：“看来德国的历史学比德国的历史更加受人尊敬。”话讲得很巧妙，但所表示的态度也很鲜明。这就是说，德国的历史，至少是近代德国在一、二次世界大战中所扮演的角色是不受人尊敬的。

今年2月，魏茨泽克总统去日本参加裕仁天皇的葬礼，有人问他对昭和天皇有何评论。他没有正面回答，而是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教育我们国家的人民正确对待过去的历史，是我的任务。”又一次表明了他的态度和立场。

记者：日本当年不也是无条件投降的吗？

刘：日本当年到底是无条件投降还是有条件投降？这个问题日本国内也一直在争论。我个人认为，日本当年说是无条件投降，实际上是有条件投降；这个条件，就是保留天皇制。

## 军费增加意味着什么？

刘：现在日本右派势力起来，恐怕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经济实力发展，大国意识越来越表现得强烈。其中很重要的标志，就是军费的增加已突破国民生产总值的1%。它这个1%可不是小数啊！在世界上仅次于美国、苏联而

占第三位。经济大国已不成问题，现在要做政治大国，接着是不是要作军事大国？这不能不令人担心呀！

记者：您这种说法有什么根据吗？

刘：50年代日本经济还很困难，就是60年代前期，这种表现也还不怎么强烈。现在的情况变了。1987年7月，我去日本参加卢沟桥事变50周年纪念中日学术讨论会，在东京街上就看到这样的情景：极右势力的高音喇叭车上插着黄色的大旗，旗上写着一个很大的天皇的“皇”字，车停在最繁华的街道，大肆宣传。有一条标语写着“打倒雅尔塔体制”。我是很注意的。

现在看来，1945年2月，美、苏、英三国首脑在苏联克里米亚半岛召开的雅尔塔会议是存在不少问题的，如把朝鲜分成南北，把日本北方领土划归苏联，把中国东北的中东铁路和旅顺港划由中苏共管等。但它有一个很大的功绩，就是决定打败德国和日本法西斯，这是应该肯定的。日本极右势力今天提出“打倒雅尔塔体制”，其真正的含义恐怕是要恢复日本的旧势力，恢复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地位吧。

记者：极右势力如此猖獗，恐怕背后是有人支持的吧。

刘：当然。但要说明的是，日本的广大国民和许多有识之士是一直反对军国主义反对天皇制的。这方面的例子太多了。就拿卢沟桥事变50周年纪念日中学术讨论会来说，与会的中日两国历史学家对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

这一核心问题取得了一致看法。正如日本学术界享有声誉的历史家远山茂树教授在会上作总结时说的那样：“对于这一点，讨论会没有任何的暧昧”。他又说：“认识日本侵略中国，不是从‘七·七’事变开始，要上溯到1931年、1872年。”“从教科书事件看，日本需要对那场战争的性质进行再认识。只有这样，才有利于探讨从1945年至今的中日关系。”

### 中国为什么反对日本 政界人士参拜靖国神社？

记者：据来自东京的消息报道，今年靖国神社的春季大祭，竹下内阁有12名阁员、自民党的国会议员有215名出席了参拜活动，议员人数比去年增加了20几名；内阁建设大臣参拜时既签了名又注上了自己的官衔，摆出一付对国际舆论不屑一顾的架势，这在过去是少有的。

刘：我也注意到了。

记者：有一位日本读者，在给编辑部的来信中这样不解地问道：你们为什么要反对日本人参拜靖国神社？那里有我们在战争中死去的亲人。

刘：靖国神社问题，我们不是反对一般的日本国民去参拜他们在战争中死去的亲人，因为一般军人，特别是广大士兵他们除了是战争的加害者外，也是战争的受害者。他们的亲人去参拜，这种人之常情是可以理解的。我们是

反对当权者去参拜靖国神社，因为他们并不是要参拜一般国民的亲人，而是去参拜包括像东条英机那样的大战犯在内的军国主义者，作为政治家，他们这样做，就是为日本侵略的历史辩解，为战犯开脱罪责，舍不得割断与军国主义的联系。

如果日本没有侵略过中国，他们天天去参拜，我们大可不必去管，何况各国都有自己的风俗习惯。问题恰恰相反。中日战争结束已经 40 多年了，但当权者如果没有正确的态度，也可以说还没有过去。

### 为民族生存投笔从戎

记者：要请教的问题很多，但限于篇幅，以后有机会再说吧。下面，请刘老介绍一下个人的经历。

刘：我的经历很简单。自出生到 20 岁，生活在湖南省北部华容县一个偏僻的农村里。父亲是师范学校毕业的知识分子，当过半年小学校长。我 14 岁那年，年仅 31 岁的父亲因病去世后，家境很快衰落下来。到 1936 年我考入长沙“湖南国学专修学校”时，家中已欠下了一大笔债。我入学第二年爆发抗日战争，许多热血青年奔赴抗日前线。我也投笔从戎，于 1938 年夏天到达抗日根据地陕北，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翌年 7 月从抗大毕业后，被分配到冀（河北省）南行署任宣传科长。整个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我就是在那里度过的。

记者：参加过战斗吗？

刘：虽说不是战斗部队，但经常与敌人遭遇。有一次，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茨坐飞机指挥大扫荡，他的飞机就在我们头顶上盘旋。我们的一个勤务员牵着两匹马，躲在一棵树下，不幸被敌机扫射牺牲了。

记者：为了民族生存和解放，中国人民不知付出了多么巨大的代价。

刘：那时在战斗中，我们的部队经常俘虏到一些日本兵。部队把他们送到军区政治部敌工部，经过一段时间教育，再把他们送到延安日本工农学校学习，成为反战的力量。因为行署和军区在一起，所以我们常同他们在一起开会，一起去向被包围起来的敌人碉堡喊话。这就是我同日本人打交道的开始。

记者：真是不打不相识啊。

## 难忘的日本友人之情

刘：1943年，我因得了肺结核，去太行山部队医院养病。想不到医院主任竟是一位日本人，当时取了个中国名字叫白云。他给我作了仔细检查后说，你的肺结核不那么严重，但肺部血管已经破裂，只有山东阿胶（一种用驴皮熬制成的中药）可以救你的命。当时医院仅有一块阿胶，还因备战藏在一个山洞里。大概是我的命大吧（笑），居然找到了。吃下后，慢慢地把血止住了。我在那里住了

一年，与白云主任结成了好朋友。

记者：这可是不寻常的友谊。后来呢？

刘：战争结束后，他回到日本，恢复了日本名字，在一家医院任院长。1963年冬天，我随中国学术代表团首次去日本访问。团长张友渔因病住进这家医院。我去看望团长。等我出来打听那家医院，才知道佐藤院长就是当年为我治过病的白云主任。失之交臂，太遗憾了。以后我几次去日本，但都未能见到他。

记者：后来您到日本去过几次？都是为什么去的？

刘：第二次是1979年10月，应东京大学校长向坊隆先生之邀，作为特聘教授前往该校研究生院讲授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在那里呆了三个月。回国后，以这次讲学的内容为主，出版了《赤门谈史录》，书名“赤门”即东大的校门。

第三次是1985年4月，应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会长井上靖先生之邀，我与梅益（当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秘书长）共同率领中国历史学家代表团访日两周，这次到了北海道。

最近的一次，就是前面提到的参加卢沟桥事变50周年纪念日中学术讨论会，主办单位是日中学术恳谈会和东京日中人文社会科学交流会。此外，还有庆应大学、早稻田大学等。

记者：先生多次访日，请谈谈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和感想。

刘：无论是从历史还是亲身体验来说，我认为日本民族是一个很有特点的民族，一个优秀的民族，一个富于创造性的民族。四次访问，有三次不是秋天就是冬天，只有第三次是四月中旬，赶上看樱花，这是我终生难忘的。我曾经这样想：日本人为什么把樱花奉为国魂呢？原来樱花开的时间很短，只有二三天，但满树的花一下子都开了，是那么的美丽。日本人民酷爱樱花，就是希望像樱花那样，生命虽然很短，但要拼命地干，干出一番事业来。这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

记者：最后，我还想打听一下，先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从事历史研究而成为著名历史学家的？

刘：抗日战争结束后，解放区开始创办大学，我又投戎从笔，先后担任北方大学教务处副处长、华北工学院副主任。1947年秋，北方大学校长、历史学家范文澜成立历史研究室，我又被调到那里去工作。从此与历史研究结下了不解之缘。我的第一部历史著作《美国侵华史》，就是这时写的。新中国成立后，参加创办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并在其中工作至今。

记者：谢谢！